本版编辑：曹颖新　E-mail:wenshiban@hotmail.com　Tel:010—62806236　　2015年6月8日

史 镜

古代皇帝的反腐招数

□张晓政

腐败是伴随封建社会的一大顽疾痼疾，也是历朝历代极力想要解决的迫切问题。尽管由于腐败治理的难度与复杂性，以及古代反腐制度机制本身存在的深刻内在矛盾，这个问题从未得到根本解决，但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古人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丰富的反腐经验，其中成败得失，至今仍具有借鉴与警示意义。

汉宣帝“加薪促廉”

汉宣帝刘询是汉武帝的曾孙、戾太子的孙子。汉武帝征和二年“巫蛊之祸”发生后，戾太子及其子女皆蒙屈而死，唯有尚在襁褓中的刘询幸存下来，但从此流落民间，直到十七岁时被霍光等迎立为帝。由于从小在民间长大，汉宣帝深知民事艰难、闾里奸邪以及吏治得失，深知百姓对于政治清明的期盼。他在位期间励精图治，特别是大力整饬吏治，史称“吏称其职，民安其业”，被后世誉为“宣帝中兴”，不少史论者认为，宣帝时期乃有汉一代最为鼎盛的时期。

那么，汉宣帝是如何治吏的呢？出人意料，汉宣帝治吏的一个重要手段，是给基层官吏“加薪”。神爵三年，汉宣帝颁布了一个诏令：“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无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

西汉官员的俸禄，从中央政府号称万石的三公到县里面百石以下的斗食佐吏，一共20多级，越在基层，职位越低，俸禄也就越薄。特别是对于为数众多的低级官吏，还不像高官重臣，时不时能得到朝廷赏赐，如果仅靠薪水养家，难免有衣食温饱之忧，因此，若是有什么“侵渔百姓”的现象，怕是也不足为奇了。

如前所说，汉宣帝从小在民间长大，深知百姓疾苦，在他成长过程中，恐怕没少见到百姓受基层官吏盘剥勒索的情景。与此同时，他又清醒认识到，这些和百姓直接打交道的小官小吏，拿着微薄薪水，承担着大量繁重的日常事务，光靠道德说教，或者靠汉武帝时期那种严刑重法，想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难矣”！古语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要让这些基层官吏安于职守，廉洁奉公，除了严厉惩治腐败外，还必须给予他们宽裕的生活保障，使他们不必挖空心思从百姓身上捞油水、找回报。

以怀着对百姓的感情为出发点，最后却落在了给基层官吏“涨工资”上，看似背道而驰，却深刻体现了汉宣帝冷静的现实主义态度。特别是将加薪对象限定在基层官吏上，说明汉宣帝对此有着清醒的判断，而非滥用国家财力。

当然，汉宣帝治吏，除了加薪还有许多手段，而加薪也并不必然促廉，要使官员清正廉洁，还需要系统的配套措施，不是简单一个“加薪”所能解决。原因在于，仅有高薪而没有其他监督制约措施，随着时间的推移，拿着高薪的官员们早已忘记国家当初推行高薪的初衷，而将其视为理所应当。清代前期延续了明代低薪养吏的政策，直到雍正推行“养廉银”制度，才正式承认和给予官员丰厚的收入，但“养廉银”制度最终也还是不能满足大小官员欲壑难填的胃口，没有革除晚清吏治黑暗的痼疾。

王莽“道德反腐”

王莽在历史上一直以反面人物的形象出现，不过，如今也有人认为，王莽的治国政策，恰恰最符合儒家“王道乐土”的理念，甚至有人将他比作堂吉诃德式的悲剧人物。而王莽的失败，也恰恰说明了儒家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王莽当上皇帝后，由于帝位来得不太光彩，“欲震威以惧下”，于是外兴战事、内乱制度，上疑大臣、下扰人民，短短几年时间，就使西汉承平之业变得千疮百孔，百姓颠沛流离。

面对混乱局面，王莽以国家尚未安定为由，下令“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俸禄”，就是说，停发了所有官员的工资。接着又颁布诏令，对改革官员俸禄制度提出了他的构想：“古时候，如果遇到年岁丰收就增加俸禄，如果遇到歉收时就减少俸禄。如今不妨也制定一个标准，依据时节好坏，核发官员俸禄。”

王莽这个构想，与今天有些人提出将公务员工资与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相挂钩的建议可谓不谋而合，既契合古制，又颇具现代理念。可惜的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特别是统计手段下，根本就不可能制定出这么一个计算丰歉多少的标准，结果是，各级官员最终还是领不到工资。

那么，官员领不到工资怎么办？可想而知，“天下吏以不得俸禄，并为奸利”，“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赇赂以自供给焉”。而看到大小官员丝毫不能体会自己的良苦用心，丝毫不以国事为重，丝毫没有与百姓同甘共苦的情怀，王莽愈加恼怒，进而下令，对贪污受贿官员“收其家所有财产五分之四以助边急”，并动员鼓励小吏告发上司、奴婢告发主人，冀望以严刑酷法杜绝腐败。谁想腐败却愈演愈烈，百姓也越来越不得安生，终于一发而不可收拾，短暂的新莽王朝轰然倒台。

王莽取消官员俸禄，与他所推行的诸多“托古改制”措施一样，绝不仅仅是“闹剧”而已，背后反映出来的其实是一种强烈的道德主义色彩。认真说来，这项措施难道不正符合人们的道德期盼吗：作为国家官员，不是号称为百姓服务吗？那就不但应当和百姓同甘共苦，而且还要吃苦在前，就算少拿、不拿工资，又有何不可？只不过，这样做的效果如何，现实同样也已经给了王莽答案。

事实上，官员无俸作为一项制度，在历史上还果真存在过。北魏前期实行的就是官员无俸制，国家对官员只进行不定期的班赏。由于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各级官员只好“取之于民”，“吏多贪墨”“士无风节”“货赂大行”，“贪者得肆其奸，廉者不能自保”，吏治陷入整体性腐败，尽管朝廷多次严厉惩治，但收效甚微。直到孝文帝改革，才全面推行俸禄制，北魏官员无俸制也成为中国古代官员俸禄制度史上一段短暂的插曲。

朱元璋“铁腕治吏”

中国历史上，朱元璋大概是出身最底层、经历最坎坷的皇帝了。他出身贫苦农民家庭，从小是个放牛娃，16岁时父母死于瘟疫，只好去寺院当小沙弥。谁知又遇荒年，连寺院都没饭吃，只好又去云游四方，边乞讨边打发正当青春的生命时光。他后来参加起义队伍，也是从士兵干起，一步一步走上人生的顶峰。正是因为这段崎岖的人生道路，因为尝尽底层生活的艰辛，朱元璋对于贪官污吏有着发自肺腑的愤恨，堪称史上治贪治吏最严酷的皇帝。朱元璋治吏严酷到什么程度？像凌迟、弃市等刑罚已不能满足他的愤怒，朱元璋甚至发明出了令人不寒而栗的“剥皮实草”酷刑。在这样的高压政策下，有读书人因为害怕做官，不惜剁指自残以逃避征举。尽管后世对于朱元璋的性格、手段以及政策有诸多争议，但对于他治贪治吏的真诚却少有怀疑。

应当说，中国古代对于惩治官员腐败，至少在制度设计上并非全然阙无，甚至从总体上看，对官员犯罪的惩处还重于常人，即使遇有大赦，也常特别申明，贪官污吏不在其中。但像朱元璋这样手段极端的，实属空前绝后。也许正是因为过于严酷，朱元璋死后，后来的皇帝纷纷废除了他的大多数政策。

如果说如此苦心孤诣、心血倾注却连自己的子孙都不能理解，尚且可以大度地苦笑几声，而一腔热情却未能带来吏治的清明，就不能不令朱元璋感到憋屈了。可以说，自从坐上皇位的那一天起，朱元璋就与贪官污吏作不懈的斗争，然而直到他死，贪污腐败也从未消绝，以至于朱元璋曾经充满无奈地说：“我欲除贪赃官吏，却奈何朝杀而暮犯！”

由朱元璋所确立的明代治吏两条基本思路是：低薪养吏与高压反腐。低薪，最终被明代中后期普遍性的吏治腐败证明是笑谈；高压，也在朱元璋、朱棣等政治强人死后化为烟影。回想到朱元璋那一声“朝杀而暮犯”的叹息，我们仿佛看到了一种英雄无力的悲凉、一种进退两难的无助。

结论

回顾汉宣帝、王莽与朱元璋三种思路迥异的反腐模式，很难简单作一褒贬。一方面，如果说加薪或者高薪就可以养廉，我们就无法理解一些贪官超乎需求、近乎病态的对金钱疯狂的占有欲望，清代“养廉银”的失败便是对这一模式的否定。同样，不论是道德教育，还是严刑重法，在顽强的贪腐面前似乎也都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就此认为这三种模式全无是处。如果用现在的眼光看，汉宣帝的做法，近似于通过赋予官员职业保障，解决“不必为”的问题；王莽的做法，相当于加强道德教育，解决“不愿为”的问题；朱元璋的做法，则是以严厉惩治，解决“不敢为”的问题。而在我们今天看来，还应当加强制度的力量，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解决“不能为”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只有多管齐下、多措并举，才能实现对腐败这一古今中外头等难题有效的综合惩治。

廉如水　猛如虎

□高中华

一廉如水，一猛如虎，这是古代民间对一些廉洁、清正的监察御史的赞誉。元朝的御史董文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当时，江淮一些地方大臣有专恣弄权者，因畏忌御史台察之督察，遂向皇上建议把地方按察司划归行省之下，御史须受行省长官的节制。元世祖让大臣廷议。有大臣认为行台、行省两机构并列职能交叉，政出多门，不利于统一管理，可划归地方管理。董文用等大臣则坚决反对，奏称：“御史台，譬之卧虎。虽未噬人，人犹畏其为虎也。今虚名仅存，纪纲不振，一旦摧抑之，则风采尔然，无复望者矣。”董文用把御史喻为“卧虎”，确是得当的比喻。但欲使虎能发挥威慑作用，则不能对之过于束缚。御史既是天子耳目，代表天子监察百官，其监察权之行使，自应不受其他因素的限制而保持其独立性。

董文用还举了重臣阿合马的例子。当年，阿合马用事时，“商贾贱役，皆行贿入官”，朝廷想撤掉他全部的党羽，但廷议时一些大臣竟反对，这就是阿合马“售私恩，而朝廷骤敛怨也”。乃派各地按察司出面查处，将那些罪证确凿的全部撤掉，从此“吏有所惮，民有所赴诉”。所以，地方行省按察司大有存在的必要，怎能轻易撤掉呢？董文用所言，有理有据。最后朝廷决议保存行省按察司，行政机关欲约束御史台的提议终未被采纳。

董文用任御史中丞后，认为御史中丞之责在于辅助御史大夫，应从大局入手，而不能把眼光只放在纠举几个不法之徒上。国家兴盛，需要贤良志士，御史台一方面负责弹劾不称职之人，另一方面还肩负着为国家推荐人才的职能。他曾说：“中丞不当理细务，吾当先举贤才。”他通过考察、品评，推举了胡祇遹、王恽、雷膺等十多人担任地方行省的按察使，徐琰、魏初等人担任行台的御史中丞，时人都认为推选的是良才，“以为极选”。

董文用敢于直言，被大臣称为对得起他自己的俸禄。当时中书右丞卢世荣专权，以聚敛为功，无人敢言。董文用敢于当面责问：“牧羊者，岁尝两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献之，则主者因悦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羊无以避寒热，即死且尽，毛又可得哉！民财亦有限，取之以时，犹惧其伤残也。今尽刻剥无遗，犹有百姓乎！”卢世荣竟不能对。为此，朝中群臣评论董文用“不虚食俸禄者”。

元世祖时期，丞相桑哥自认为深受元世祖宠爱，也想让御史台屈从于他，为其所用。他私下派人暗示董文用在元世祖面前为他歌功颂德。董文用不屑做这种事。桑哥心里很不高兴。且董文用直言不讳，桑哥想处之而后快。桑哥决意先从打压御史台入手，私下派人搜集御史台一些事情，寻找攻击突破口，每天上朝时在元世祖面前说御史台的坏话。每次董文用都站出来与桑哥据理力争，从不屈服。一计不成，桑哥改为集中力量直接攻击董文用一个人，说他傲慢不敬。元世祖深知董文用的为人处事，就说：“董文用是个御史，他所做的是他的职责，他为人端庄谨慎，跟随我多年，我自然了解。丞相以后还应该多与他配合才是。”桑哥才计无所施。

1294年，元世祖逝世，成宗到上都去继位，董文用随同前往。成宗登基后，想去打猎放松一下。董文用认为不妥，就晓之以理：“先帝刚去世，陛下在外面打猎寻乐，不按时回朝，怎能慰藉先帝在天之灵。速回京城，总理朝政，这才是先帝所期，百姓所盼。古人说，国君就像北斗星，方位居正，众星拱之，否则天下难治，陛下应该记住这个道理。为君者，一举一动关系国家命运，所以必须谨慎行事。”这番话说得成宗心悦诚服，当天即归程。

董文用从不居势自傲。元世祖多次对董文用说，很想见见他的家人，可带他的儿子们来宫中。这可谓是很多官员梦寐以求的事。然而，董文用婉言谢绝说：“我的儿子没为国家做出一点贡献，怎能接受皇上的恩赐呢？”

董文用的才干被重臣阿术看中，想带他一起南下伐宋，董文用予以婉言谢绝。他认为自己不宜随军南下，因为按照元朝规定，带兵在外驻扎的大将其子弟不能从职于军队，以避亲戚合谋生乱之嫌，而当时他的哥哥董文炳正带兵镇守山东。阿术劝董文用毋庸多虑，“你跟随皇上多年，不必拿这条规定约束自己，皇上怎会怪你呢”。董文用考虑再三，仍觉不妥，但不便伤阿术的面子，就假称有病不能随军前往，阿术遂作罢。

中华春秋

中华“和”文化一印一书法系列作品



和善亲盈

作者：李铁



作者：阿朗一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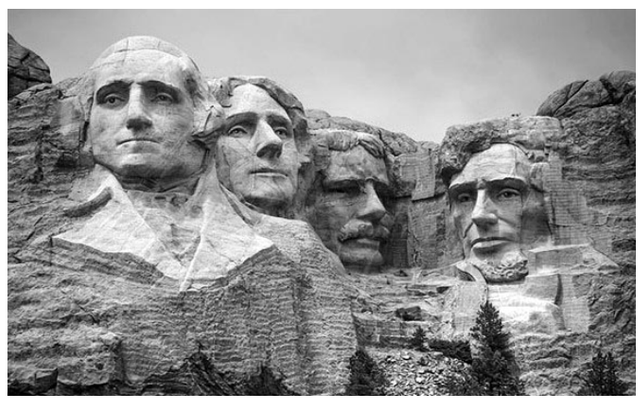
有所思

杰斐逊的民主架构及其局限

□徐华娟　强　大

杰斐逊是美国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和科学家，曾任弗吉尼亚州州长，美国第一届国务卿、第二届副总统和第三届总统。他起草的《独立宣言》被马克思誉为“人类第一个人权宣言”。由于时代和阶级的限制，杰斐逊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所坚持的民主自治仍对后世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在《独立宣言》中杰斐逊宣称：“我们认为下面这个真理是神圣的和无法否认的：人人生下来就是平等的和独立的，因而他们都应该享有与生俱来的、不能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的保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他用“追求幸福”的权利代替洛克的“财产权利”，这就有原则性地打破了洛克关于财产权这一自然权利论说的局限性，把广大人民的渴望和要求反映到自然权利学说中来。



在民主参与方面，主张实行普选制。杰斐逊说：“就我所知，社会最高权力的最可靠掌管人只能是人民自己。”人民本身才是政府唯一安全可靠的保管者。他认为，人民对政府控制的主要手段之一，是人民可自由选择和罢免自己的代表。共和制应是人民的统治，为此他坚决主张实行普选制，使所有成年男性公民都有选举权。

在舆论监督方面，杰斐逊认为，人民的舆论是民主政府的基础之一，要使舆论保持正确，就必须依靠新闻媒介和新闻自由。早在1799年初，他就写信给麦迪逊说：即将来临的夏天将是“要付出巨大精力和牺牲的时节。发动机就是报纸。每个人都必须以他的钱袋和笔杆子作出贡献”。杰斐逊认为报刊既是科学的朋友，又是自由的保障。报纸能揭露政府和官员的不法行为与阴谋，帮助民众监督政府。他认为只有出版和新闻自由才能提高人民的识别能力。他也承认民众偶尔会被错误的舆论所误导，但很快会觉悟过来。在他任总统期间，受保守派和联邦党人影响的报纸造谣中伤，攻击和诋毁政府的施政方针，但杰斐逊出于维护新闻自由的原则而听之任之，使新闻媒体监督政府的职能得以保存和成长。

在制约政府权力方面，杰斐逊认识到不同的政党在现代民主政治中的作用。不同的政党不仅表达人们不同的政见，也是抑制当权党派为非作歹的重要力量。他赞成帮助不同的党派，借助反对党对政府和执政党进行监督。

这位认为“好的政府要依靠法律来稳定民心”的开国者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其民主主张的受益者主体并非人民。杰斐逊的民主思想带有一定的激进性质，他虽支持人民反抗政府的活动，但他并非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只是基于美国民主建设的需要而向有关政府人员私下提出来的。他虽赋予人民革命的权利，但目的却不是为了人民，仅仅为了警示统治阶级。杰斐逊自始至终都认定，只有“天生的贵族”而非普通公民，才能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他希望通过学校教育能够培养出来“知情、警惕的公众”，而所谓“知情”，仅仅意味着了解某个官员的品行。他希望借助于人民的力量，加快民主建设，以期实现其党派的利益和要求。在当时，广大中等资产阶级、种植园主的利益正由于此民主制度而得以保障。普通公民依然难以获得政府职位，绅士阶层的精英社会生活依然在延伸。

性别及种族歧视。杰斐逊曾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我们联邦必须被看作是一个巢窟，从这里开始，整个北、南美洲将住满居民。”杰斐逊所谓的“居民”是指人口不断增长的美国白人。他曾宣称在自然法则下一切人生来平等。但他所主张的普选权只针对男性。根据1776年宾夕法尼亚州、1784年新罕布什尔州、1791年特拉华等州对于选举权的规定中，几乎所有白人男性都符合标准。在教育内容上，他所提倡的女子教育也仅仅包括法国语言、舞蹈、绘画及音乐等内容，并且女子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利，这就与人类从根本上实现自由平等的愿望相抵触。尽管他为黑人奴隶解放做出了不懈努力，但奴隶制仍未彻底废除，而且他本人就是一个奴隶主。这是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也是杰斐逊本人思想的局限性。

政党政治演变为制度化的两党政治。杰斐逊虽然亲手组建了美国第一大民主政党，但他从未承认过政党政府的合法性。他曾宣称：“我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派别，也不是两个派别之间的骑墙者”，“如果我一定要加入一个党才能进天堂，那我宁可不进天堂”。正如政治学家哈维·曼斯菲尔德所指出的，杰斐逊从来没有想要施行永久当权和临时的政党轮替，他是想利用民主共和党作为工具来击退联邦党。一旦击溃联邦党人的计划，杰斐逊希望他自己的政党也能够安全地隐退，恢复宪法的无党派特性，人民也将“整齐地沿着正常的自由、秩序的道路上前行，并神圣地忠于宪法”。然而事实是，民主共和党并未成为一个“结束政党的政党”，由于对立的政治见解产生冲突，政党反而进一步发展壮大起来了，两党制的轮流坐庄竟然成了惯例，也使国家政策常常摇摆不定，远未实现社会“迅速回归到全面的和谐状态”。

尽管如此，杰斐逊对美国政治模式的贡献是巨大的。在他的努力下，总统的职位显示出了民主的色彩；在他的努力下，美国朝着反精英主义方向发展。然而，杰斐逊的民主构想是理想化的，他心向往之的民主事业或可称之为平民统治的事业。如果不考虑这个国家的其他社会因素，这个构想如果能够实现则会对政治稳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